

# 论宋人撰集当朝史

刘 芑 著



三秦出版社

92.44

## 目 录

|                      |      |
|----------------------|------|
| 一、总体规模 .....         | (1)  |
| 二、历史原因 .....         | (6)  |
| (一)政治危机 .....        | (7)  |
| (二)史学危机 .....        | (16) |
| (三)史家传统 .....        | (23) |
| 三、编修特点 .....         | (28) |
| (一)重编年,转相发明 .....    | (28) |
| 1. 体例的选择 .....       | (28) |
| 2. 长编体 .....         | (32) |
| 3. 纲目体 .....         | (46) |
| 4. 编年体的改造与发展 .....   | (55) |
| (二)勤考证,求是传真 .....    | (63) |
| 四、史料价值 .....         | (70) |
| (一)宋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 | (71) |
| (二)宋代的经济 .....       | (77) |
| (三)宋代的文化 .....       | (82) |

---

私家撰集当朝史，历代间或有之，宋朝尤盛。宋人私撰之当朝史，数量多，质量高，体例齐备，格局新颖，包容空间层次丰富，载记时间绵延相属，传统与创新熔铸一体，史家之独断层出不穷，展示了独有的史学个性。这一现象虽然在隋唐以降官府垄断修史的沉闷空气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这并非是传统史学的偶然变异，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史学机制的内在因素。本书试图从这一现象的总体规模、历史原因、编修特点、史料价值四个方面做一初步探研，抛砖引玉，以就教于专家。

## 一、总体规模

陈傅良《建隆编》自序曰：“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御集，又有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记<sup>〔1〕</sup>。”陈氏所云，指出了宋朝当代史史料的两大体系，一是官府修撰的国书，二是民间撰集的私史。元修《宋史》主要取材于宋代国书，《宋史》修成，这些文献便逐渐散失，如今所能见到的，只有钱若水等修《宋太宗实

---

〔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

录》残帙二十卷和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宋会要辑稿》五六百卷，仅为全数的十之一二。宋代之私史，元府未曾尽见，多为民间收藏，虽散而不失，重要史籍得以保存。今存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非全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乙集四十卷，李攸的《宋朝事实》二十卷，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北盟集补》五十卷，王称的《东都事略》一百五十卷，熊克의《中兴小历》四十一卷，《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卷，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四十卷，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李璣的《皇宋十朝纲要》二十五卷，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以及《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中兴两朝圣政》六十四卷，计一千七百四十卷。

宋官修国书名类繁多，形成了多层次的史料系列。苏天爵云：“天子动静则有《起居注》，百司执事则具于《日历》，合而修之曰《实录》，有《实录》方可为《国史》<sup>〔1〕</sup>。”宋有十三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三百

---

〔1〕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

五十卷，另有卷数不详的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中兴四朝国史》，总卷数当在千卷左右。宋私家撰集的国史现存一千七百余卷，若再加上散失的著作，如徐度的《国纪》五十卷，李丙的《丁未录》二百卷，赵牲之的《中兴遗史》六十卷，以及陈均的《中兴编年举要备要》，杨仲良的《本朝通鉴长编节本纲目》等书，总数可达二千至二千五百卷左右。以宋朝正式颁布的《国史》与此数相比，私史的数量超出《国史》一倍有余。

《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史部书有四万三千零九卷，去掉过录《新唐书·艺文志》的二万九千二百零一卷，所剩宋书一万三千八百零八卷，以宋人私修国史为二千卷计算，此数占宋代史部书的近百分之十五。《四库全书》著录的史部书为二万一千九百五十卷，其中宋人私修之国史一千余卷，占中国封建社会官私史书（不含《四库全书》以后之史籍）的近二十分之一。我国史部类例包容甚广，若仅以当朝史而言，宋人私撰国史的比例将会更大。

史书的体例，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体例的多寡优劣，亦是衡量史学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宋人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编年体是宋代私人撰集国史的主要载体形式，根据不同的撰述目的，又将编年体分别改创为

长编体和纲目体两大支属，创造性地运用、发展了编年体。《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是长编体的主要著作。《宋九朝编年备要》、《皇宋十朝纲要》、《两朝纲目备要》是纲目体的主要著作。

纪传体虽然被官府垄断，但私家著述在这个领域里仍然有所作为，《东都事略》是也。

会要体史书，专载朝廷典制，事关国体家法，而私史敢于在此处下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也。

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体园用神，堪称史体的后起之秀，宋人首创此例，并成功地运用于当代史的记叙之中，《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是也。

宋人私撰当朝史著作近二十种，采用的史体就有编年、纪传、会要、纪事本末四种，几乎完全包括了封建社会载记史事的各种形式，并多有发明创新，显示了宋人在史体的运用上敢于突破旧有格局，各领风骚的活跃局面。

由于史书体例齐备，宋人可以用多种方式记事，给剪裁史料带来新的途径，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各类史籍的质量，发展其特有的个性，而且在整体上各种史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互为参证的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和更为合理地梳理

当代史事。宋人记事之详多，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诸多功能各异的载体形式，事详而不繁，书多而不累，表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和多层次的关联。

从时间断限的角度看，宋人私撰之当朝史可以说是众手修成的一部断代史。有宋一代，垂三百年，史家秉笔不辍，年有所记，几无时间上的空断，在历朝私修国史上是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朝。

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七事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宋朝事实》、《九朝通略》、《宋九朝编年备要》，跨北宋、南宋记事的有《皇宋十朝纲要》、《三朝北盟会编》，记南宋九朝一百五十二年事的有《中兴小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高宗朝）、《中兴两朝圣政》（记高、孝两朝）、《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记高、孝、光、宁四朝）、《两朝纲目备要》（记光、宁两朝），《宋季三朝政要》疑为元初宋遗民所作，所以本文未列入宋朝当代族史之中，然而书的编纂显然是宋人私撰当朝史的直接延续，姑录此备之。是书记南宋末年理宗、度宗、瀛国公三朝五十年史事，附录一卷记帝昀、帝昺三年事。至此，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帝昺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三百一十九年间的史事，皆录之于私史。

综上所述，宋人私撰当朝史的总体规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曰浩大的卷帙，二曰齐备的体例，三曰完整的时间跨度，三者各具其功，又相互依存，形成了宋代史学独有的构筑风格。

## 二、历史原因

史学的功能之一是揭示历史演进最基本的因缘关系，即梁启超所谓：“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触发者谓之缘<sup>〔1〕</sup>。”宋代私撰当代史之盛的因缘，概括起来是两个危机，一个传统。一是政治危机：北宋内图变法，外御强夷，厉精图治垂百七十余年，但半壁江山，一朝沦丧，朝野上下，无不震惊，人们对当代的历史有必要认真反思，史学家们慨然以此为已任，纷纷著书立说。二是史学危机：一，北宋败亡，官修的国书和典册图籍严重失散，见诸文字的记载眼看沦为口碑，抢救文献是史家的当务之急；二，官修《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产物，朱墨相攻，是非几易，难以传信，就此之时，私家著述网罗旧闻，荟萃同异，以求匡谬正一。三是封建史家历来有注重当朝史修撰的传统，社会的动荡不安，更激起了他们

---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蹟之论次》。



强烈的责任感，实录当代竟成潮流。以下分而述之。

### (一)政治危机

有宋一代，自始至终都受到北方对峙政权的威胁。宋朝建国伊始，北方就赫然屹立着刚刚崛起的辽朝政权。在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前（公元960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就乘五代之季世得到了封建经济相当发达的幽云十六州（公元938年），至宋太宗兵锋北向，围攻南京时（公元980年），辽朝已然休养生息四十余年，宋军兵疲师老，攻辽已成强弩之末，一战而败，恢复之计未能实现。事实上，五代的残局，是宋辽两朝共同收拾，分而享之的。宋朝虽然据有中原、江南广饶富庶的土地，兵源、粮草远比辽朝充足，然其兵制的改造绝不利于强战，埋下了“十战九败”的根源。此后北方政权虽两易其主，但宋廷始终未能乘其危机，反而先败于女真，后亡于蒙古。

由于宋朝处于外部威胁无时不在的环境之中，由此而造成的政治气氛深刻影响着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尤其影响着史学家对历史和现实的审视与思考。

北宋亡后，金人挟夺土虏帝之雄风，锐意渡

江。采石战前，完颜亮曾赋诗言志：“万国车书久混同，江南何尚隔华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sup>〔1〕</sup>”行色甚壮。对于南宋朝廷来说，北宋亡国尚在饮恨之中，苟安南隅亦不敢自保，士大夫阶层骚然浮动，忠臣义士各竭其思虑以图良策，一时间议论颇盛，其中不乏卓然有建树者。宋代名相李纲上书云：“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务自治，专一以守为策<sup>〔2〕</sup>。”李纲头脑冷静，文武兼备，在抗金复国的斗争中脱颖而出，所论皆当务之急，甚得朝廷倚重。但权臣谗言其有“镇主之威”，终遭排斥。但他“专一以守为策”的主张，最终成为朝廷对金政策的基本原则。叶适亦曰：“虏兼并强大而难攻，故言者皆曰当乘其机；精久坚固而不可攻，故言者皆曰当待其时。夫究其本来，审是计虑，而后知所以施为之后先，然后知机自吾发，非彼之乘，时自我为，非彼之待<sup>〔3〕</sup>。”如何将据守图治，变弱为强将这一指导思想施之于政，人们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计从何出，其可行性皆取决于是否合乎实情，是否对当代历史的演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方面，惟有史家的工作最为扎实，他们撰

---

〔1〕 无名氏《中兴御侮录》卷上。

〔2〕 《宋史》卷五《李纲传》。

〔3〕 叶适《水心集》卷一《上孝宗书》。

集了大量的当朝史，为南宋的中兴久安提供了最直接，最现实的鑑戒。

李焘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五年，亲身经历了靖康之难，少年意气，“慨然有志驰驱”，然“值权臣力主和议，务以术消弭天下忠义敢为之气<sup>〔1〕</sup>”，马革裹尸之志，未能实现，于是转而弃戎从史，“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sup>〔2〕</sup>”，以此补益朝廷之谋谟。“甫冠，已著《两汉鑑》，明年，追念靖康变故，著《反正议》十四篇<sup>〔3〕</sup>”，“皆救时大务<sup>〔4〕</sup>”，李焘二十岁上就已颇具史识，时“人皆奇之<sup>〔5〕</sup>”。焘二十四岁擢进士第，官职迁转，公务缠身，仍“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sup>〔6〕</sup>”，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渐成于胸中。而立之年，李焘便着手于《续资治通鑑长编》修撰的准备工作，至古稀之年，《长编》乃成，“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缀辑穿联踰一千卷，……精力几尽此书<sup>〔7〕</sup>。”反映了李焘毕生辛勤耕耘献身于当代史撰述的精

---

〔1〕《永乐大典》卷一〇四二—李壁《雁湖集·巽岩先生墓刻》。

〔2〕《宋史》卷一四七《李焘传》以下简称《李焘传》。

〔3〕《永乐大典》卷一〇四二—《周益公大全集·敷文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以下简称《李焘神道碑》。

〔4〕《李焘传》。

〔5〕《李焘神道碑》。

〔6〕《李焘神道碑》。

〔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三李焘《进续通鑑长编表》。

神。

李焘著《长编》的宗旨，就是要撰集一部信实可征的北宋史，供朝廷以近取譬。他在宋孝宗隆兴元年《进通鑑长编状》中说：“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sup>〔1〕</sup>。”所谓“最大事”，就是“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sup>〔2〕</sup>”。清人孙原湘高度评价了李焘敢于触及北宋历史上最敏感、最有争议的重大事件的精神，他说：“此书真一代之良史也。今即其所举最大事者数条考之。其于开宝之禅，首采吴僧文莹之言及蔡惇《直笔》，然后参以程德元（玄）传及《涑水纪闻》，传疑也。其于涪陵之贬，引《建隆遗事》而实之，以太宗即位之初，廷美尹开封。德恭授贵州防御使，与太祖传位之迹略相似，以明传闻之说未可全弃，著实也。于澶渊之盟，则引陈莹中之言，以为寇准之功不在主亲征，而在于

---

〔1〕《文献通考》卷一九三李焘《进续通鑑长编表》。

〔2〕同上。

画百年无事之策，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且可无靖康之祸，其意直谓靖康之事，皆由景德误之，原祸始也。于西夏之封，先载富弼一疏，复载吴育备边之疏、田况边兵之奏，而实以韩琦家乘之汰边兵及分遣内臣汰诸路兵，彰国弱之本也。于英宗之复辟，则首著韩琦之谏及光献撤帘事，以补《实录》所不载，而于蔡氏《直笔》、邵氏《见闻》、王氏《别录》载太后不乐还政等语并削去，明臣道之权也。至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则尤旁参互审，辨异析同，使邪正心迹纤毫莫隐，尤人所难言。凡此数事，浅识既不能言，拘儒又不敢言，而文简以宋臣言宋事，独能继南、董之笔，援《春秋》之义，发愤讨论，使众说咸归于一，厥功不在司马氏下矣<sup>〔1〕</sup>”。

《长编》的修撰，确实起到了警示当朝的作用。淳熙四年，李焘全书进上，宋孝宗颇有感慨地说：“凡列圣之功德，一代之制度，忠邪之议论，夷狄之叛服，表年提要，总为巨编，自建隆迄靖康，成书殆千卷，使朕览乎家法，兴起于事功<sup>〔2〕</sup>”。盛赞其书“无愧司马光<sup>〔3〕</sup>”，孝宗“李他语字文价曰：‘朕尝

---

〔1〕 孙原湘《天直阁集》卷四三《李氏续通鑑长编跋》。

〔2〕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X《玉堂类稿》六。

〔3〕 《李焘传》。

许焘大书：续资治通鑑长编七字，且用神宗赐司马光故事，为序冠篇<sup>〔1〕</sup>”。李焘在世时《长编》部分卷帙在民间流传，世人争相先睹为快，焘卒之后，更是“争相副墨价千金<sup>〔2〕</sup>”。由于皇帝为之书名制序，士大夫往往揭之座右，议论国事，每多称引，也有不少取材《长编》再作它书者，就连《国史》也“颇采李焘《长编》<sup>〔3〕</sup>”。可见其书对南宋政治的影响是相当深刻而广泛的。

《长编》首开私撰本朝国史风气，其后踵继者纷至沓来，形成了取鉴当代的史学思潮。

太学生陈均著《宋九朝编年备要》，对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历史做了一个全面评价，竭力探寻其由盛而衰的原因。时人真德秀赞曰：“美哉书乎！圣祖圣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赫赫乎煌煌乎备于此矣。然综其要求之，则自艺祖以来，凡所以祈天永命垂万世无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数端。盖其以仁立国而不杂五伯权利之谋，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邪说之说，求治宁悠缓而不为一朝迫切之计，用人宁朴纯而不取小夫轻锐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庙之诤谏，缙绅诤之论建，相与保卫扶植如

---

〔1〕《李焘神道碑》。

〔2〕引自裴汝诚《续资治通鑑长编考略》。

〔3〕《李焘神道碑》。

恐失之，以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宁辅出新意、改旧法，高谈古始，阴祖管、商，而国脉病矣；史为尊经，实尚空寂，而学术乖矣。谓参苓耆术不急于起疾，而一切杂进者皆决肠破胃之药，根本安得弗伤。谓鼎鼐琮璧不足以适用，而错然前陈者皆奇诡淫靡之具，风俗安得弗坏。章、吕鼓其波，二蔡炽其焰，更倡递述，至于黼极矣，此其所以致乱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嘉、可慕、可叹、可愕者，一揽而尽得之，真我宋千万年之龟鉴也〔1〕。”“是书斟酌损益皆有条理，非安危所系则略而弗书，其志固将有补于世，非徒区区事记揽而已也〔2〕。”

徐梦莘“生于靖康之初，元岁在丙午，是冬金人再犯阙，海内云扰。建炎二年寇躡江右，叛将大盗蜂起，公之生终四年，母氏负走陂头刘氏家，仅免于难。公既省事，自念生长兵间，欲得尽见事之始末〔3〕。”遂以宋金和战为主题编制了《三朝北盟会编》。其《自序》云：“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为中国患久矣，昔在虞周犹不免有苗獯狁之征，汉唐以来，如冒顿之围平城，佛狸之临瓜步，颉利之盟渭上，此其盛者，又其盛则屠各陷洛，耶律

〔1〕《丽宋楼藏书志》卷二一编年灯《宋九朝编年备要》。

〔2〕同上。

〔3〕楼钥《攻媿集》卷一八〇《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其易且酷也。揆阙造端，误国首恶，罪有在矣，迨至临难，无不恨焉。当其两河长驱而来，使有以死捍敌，青城变议之日，使有以拒命，尚可挫其凶焰而折其奸锋。惜乎，仗节死义之士公有一二，而媮生嗜利之徒，虽近臣名士，府首承顺，惟恐其后，文吏武将望风降走，比比皆是。……深惧日月寢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烟没不传，于是……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淹没也〔1〕”。

王称所著《东都事略》，也是旨在重新认识北宋治迹，对“熙宁之启畔，元符之绍述，尤三致意焉〔2〕”。

以上皆南宋人记北宋事者。南宋人记南宋事，其中皎皎者，首推李心传。心传有家学，其父李舜臣尝著《江东十鉴》，其弟李道传又作《江东十考》，盖以南宋与南朝事机相近而为之也。心传将考察历史的目光放在南宋中兴之际，特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两部史著述高宗一

---

〔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序》。

〔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东都事略》。



朝事。他说：“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事尤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sup>〔1〕</sup>。”他认为高宗一朝史事“皆中兴以后事迹之张本<sup>〔2〕</sup>”，上承北宋之礼乐，下开中兴之治迹，最便以近取譬，在众多当代史家中，可谓独具只眼，史称“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sup>〔3〕</sup>”。

宋人私撰之当朝史全部出自南宋，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北宋败亡所导致的政治危机是私人撰集本朝史崛起的主要原因。司马光原计划在《资治通鉴》之后续撰北宋史，并在《涑水纪闻》中积累了大量材料，但由于那时对当朝史的考察尚未有迫切感，所以司马光去世后，一时无人继其志。是严峻的现实生活造就了南宋一大批杰出的当朝史史家。事实上，每当封建王朝发生历史性转变或处于纷乱动荡的时期，都会涌现出一批当代史的著作，两汉、南北朝、南宋、明，是当代史撰述的几个高峰，都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其产生的因

---

〔1〕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序》。

〔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正月辛卯注。

〔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